

Quick

Improve

英译汉 实用教程

SHIYONG JIAOCHENG

■ 郑和平 编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英译汉实用教程

郑和平 编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译汉实用教程/郑和平编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6. 9
ISBN 7 - 306 - 02763 - 8

I. 英… II. 郑… III. 英语—翻译—教材 IV. H315.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5678 号

责任编辑: 邓启铜

封面设计: 曹巩华

责任校对: 钟 良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编辑部电话: (020)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电话: (020) 84111998,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真: (020) 84036565

印 刷 者: 广州市新明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规 格: 787mm × 960mm 1/16 16.25 印张 3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进入 21 世纪，我们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改革开放的日趋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加快，以及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外语，特别是英语，作为媒介手段和信息转换工具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社会各界对英语人才的需求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在努力学习英语。帮助广大英语学习者学习和掌握英语知识，提高英语运用能力，是英语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编者在英汉翻译教学实践过程中，对学生渴望有一本适用的教材、尽快掌握翻译知识和能力的心情深有体会。因此，编者根据自己翻译教学的实践，参考了国内外近年来出版的许多有关翻译的著作、教材和刊物，编写了这本《英译汉实用教程》。

本书分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翻译理论介绍，不仅客观地阐述了传统的翻译理论，还介绍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新理论、新观念，比如翻译的单位、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等等。第二章为翻译常用技巧。翻译技巧是许许多多的翻译家辛勤翻译实践的宝贵经验总结，掌握翻译技巧，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章为翻译实例辨析。这一章是本书与其他教材不同之处。本章收集了 300 多例英译汉实例，并对它们进行分析和提供参考译文，旨在帮助学习者找到误译的症结所在，对他们逐步提高自己的英译汉水平有所帮助。通过熟悉这些例句，使英语阅读理解与汉语写作表达能力都能有所提高。第四章为英译汉练习。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是一种技能，只有通过长期艰苦的实践，逐步摸索，积累经验，才能掌握。本书在每章节的后面没有像其他教材那样提供单句作为练习，原因有二：一是在第三章里已有 300 多实例的分析和评述，可供教师和学习者选用；二是在本章里提供了 20 篇短文练习，目的是引导学习者在翻译中树立语篇意识，克服孤立地研究一个词、一个句子的翻译的不良习惯。最后为本书附录。

本书是一本介绍和探讨翻译理论、技巧及翻译实践的书，可供广大高校本（专）科学生、成教学生和英语自学者学习英译汉时使用，对从事英译汉翻译教学的教师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作者参考了国内外近年来出版的许多有关的著作、

教材和刊物，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汲取了不少的营养，选用了一些例句和练习，有的出处在书中已标明。但大多数例句是本人在长期的教学中，从一些书籍中摘录来给学生讲解的实例，原文选自何处，现已无法查清，故未标明来源。在此一并表示十分的感谢。另外，广东培正学院李望国副院长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外语系主任廖才喜先生和罗志野教授百忙之中抽时间检查书稿，教务处的同志加班加点帮忙打印文稿；中山大学出版社邓启铜编辑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没有他们的热情关心和鼎力帮助，本书难以完成，作者对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陈桂芝，感谢她多年以来为家庭所做的一切，感谢她对我从事的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对我的关心和鼓励！

由于编者的水平和经验有限，书中难免有论述不清、分类不当、评析不详、肤浅谬误之处，敬请使用本书的师生和读者批评指正。

郑和平
2006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翻译理论介绍	(1)
第一节 翻译的定义	(1)
第二节 翻译的标准	(3)
第三节 翻译的方法	(16)
第四节 翻译的过程	(25)
第五节 翻译工作者的素质	(32)
第六节 翻译单位与语篇意识	(34)
第七节 文化意识与翻译	(37)
第二章 翻译常用技巧	(48)
第一节 词语的翻译	(48)
第二节 习语的翻译	(65)
第三节 句子的翻译	(72)
第四节 文体与翻译	(79)
第三章 翻译实例辨析	(96)
第一节 名词	(96)
第二节 代词	(111)
第三节 形容词	(118)
第四节 副词	(125)
第五节 动词	(131)
第六节 介词	(142)
第七节 连词	(149)
第八节 语气、文体和背景知识等	(155)
第九节 短语、词组	(173)
第十节 句子	(183)

第四章 英译汉练习	(194)
附 录	(223)
附录一 英译汉练习参考译文	(223)
附录二 英汉译音表	(248)
附录三 英译汉常用工具书	(249)
附录四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250)

第一章 翻译理论介绍

翻译是人类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和途径。翻译理论是无数的翻译家经过长期辛勤翻译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它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有机的结合，可以事半功倍，有效地提高翻译水平。本章简要介绍与翻译有关的几个问题：翻译的定义、翻译的标准、翻译的方法、翻译的过程、翻译工作者的素质、翻译单位与语篇和文化意识与翻译等。

第一节 翻译的定义

何谓翻译？仔细分析和比较，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对翻译的定义和阐释有不同的看法，呈现出多样性特点。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一些权威的词典和翻译理论家对“翻译”做出的解释：

英国《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给 translate 下的定义是：to turn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这样的定义最为简洁和传统，仅仅是“一言以蔽之”，只对翻译进行了较为笼统、抽象的说明。

美国《韦氏新编国际英语词典第三版》（*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给 translate 下的定义是：to turn into one's own or another language（转换成本族语或另一种语言）。这一释义与英国《牛津英语词典》的释义比较起来明显要宽泛得多，不仅提到了语际转换，同时也提到了语内转换问题。

英国的卡特福德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译出语）的话语材料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译入语）中对等的话语材料”。卡特福德的解释很有意思，他对“对等的话语材料”的考虑，从语言和文化的范围来看片面了一点。

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即话语）在保持内容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

物”。

《大英百科全书》(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a, Macromedia)给出的定义是: A continuous concomitant of contact between two mutually incomprehensible tongues and one that does not lead either to suppression or extension of either is translation. (两种语言不通的人，在接触过程中需要伴随一种连续的手段，这种既不扩大又不缩小原意的手段就叫翻译)。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 A. Nida)给翻译所下的定义是: 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Eugene A. Nida and Charles R. Taber, 1982, P. 12.) (所谓翻译，是指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是在语义上，其次是在文体上)。

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对“翻译”的定义是: What is translation? Often, though not by any means always, it is rendering the meaning of a text into another language in the way that the author intended the text. (什么是翻译？通常，虽不能说总是如此，翻译就是把一个文本的意义按原作者所意想的方式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以上是国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词典和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的定义内容。那么，我国的情况如何呢？

我国《辞海》和《汉语大词典》给翻译下的定义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1954年，茅盾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一文中对翻译，特别是对文学翻译，作了比较全面的概述：“对于一般翻译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至少应该是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又说：文学翻译“不是单纯技术和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茅盾译文选》序)

范存忠在《漫谈翻译》一文中说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已经表达出来的东西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翻译理论与技巧》，1985)“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Language-community)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或)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

原作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张今，《文学翻译原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以达到沟通思想情感、传播文化知识、促进社会文明，特别是推动译语文化兴旺昌盛的目的。”（孙致礼，《新英汉翻译教程》，2003）“翻译是按社会认知需要，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所作的信息传递过程。”（方梦之，《翻译新论与实践》，2002）

从上述的各种定义看，人们都提到翻译是“一种转换”，但对于翻译的任务、目的和内容的把握却表现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笔者认为，在众多的定义中，孙致礼先生的定义比较贴切。它既提到了翻译的本质，也提到了翻译的功能、任务、目的和内容，相对较为全面。

第二节 翻译的标准

翻译要达到什么标准？翻译的标准又是参照什么原则而制订的？翻译的标准是否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这些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在我国译界，围绕“要直译”还是“要意译”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目前，在我国翻译理论界又出现了另一种争论，那就是我国的传统的翻译理论和国外的现代翻译理论到底哪一种对翻译的实际操作更具指导意义？笔者认为，不论是“传统派”还是“西洋派”，一定要从翻译的实际去考虑这一问题，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傲视一切，应该以辩证的态度去分析、吸收、综合，既不能全盘否定，也要考虑中国文化的特点对翻译的要求。以下是笔者罗列的古今中外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翻译标准，可供作对比分析。

一、中国的翻译理论

（一）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

释道安在主持佛经翻译时，担心翻译失真，要求进行直译，《婆沙》一书便是按照他的要求一字一句地翻译的。他在《鞞婆沙序》中这样说道：“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这句话表明了他的直译的思想。他在公元382年所作的《摩诃钵罗密经钞序》中，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五失本”的原则是：①佛经词序多是颠倒的，汉译时改从汉语语法，容易失本；②佛经文字质朴，而汉人喜欢用文采性较强的辞藻，译文加了润饰，这是为了适合汉语读者，但是，这样的翻译结果

容易失本；③佛经的论述，往往为了讲透佛理而显得反反复复，这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翻译时删繁就简，容易失本；④佛经有“义说”，类似汉人韵文后加以说明的小结，与前面的内容有重复，因此翻译时被删掉，所以也容易失本；⑤一般佛经讲完一件事，总要在转说它事时重提前面的内容，不断反复后再往下说，这些重复的话语也被删除，这样做无形中也会失本。

“三不易”是：①圣人说“法”是按照他当时的表达方式完成的，到了现在，与以前大不一样了，要把古时的文章改给现在的人阅读，实属不易；②圣人的智慧不是凡人能够相比的，让现在的凡夫俗子去理解古代圣哲的高明之处，实在是不容易；③佛祖释迦牟尼的佛理高深莫测，后经其弟子出经时反复思考，仔细斟酌，不同凡响，现在由我们这些凡人来翻译，本来就已经困难重重，更何况时隔千年，谈何容易。

从上述理论看，道安翻译理论最强调的是要忠实于原文，力求合乎原文原意，要求不能因为形式的转变而牺牲原文的内容。

道安的翻译理论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译论，在当时乃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被奉为翻译的指南。例如，在鸠摩罗什译经时，参加执笔写定的僧睿，认为他的老师道安的译经理论是了不起的创举，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因此把“五失本、三不易”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翻译标准。他曾在《大品经序》中说道：“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本及三不易’之诲，则忧惧交怀，惕焉若厉，虽复履薄临深，未足喻也。”隋代彦琮在写《辨证论》对译经理论进行总结时，首先推出的就是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的译论，认为这一理论是了不起的学说，因为它能“独禀神慧”、“开通后学”。

但是，道安对于自己提出的“五失本”的第一条——颠倒外文原有词序，以符合汉语语法，进行了反思并终于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观点。后来他自己也只得赞成“时改倒句”、“言倒时从顺了”。确实，道安提出了这一点，但未能将道理说透。

（二）鸠摩罗什的“天然语趣”

与释道安同一时期的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却不受道安的影响，他极力主张意译，他的译作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跟着他一起进行佛经翻译的名僧僧肇、僧睿、道生、道融等人，在翻译原则上，与他的作风不谋而合。僧睿在《中论序》中说他译《中论》时，于“其中乖阙翻重者，法师皆裁而裨之”。僧肇《百论序》说他翻译《百论》一书时“陶练覆疏，务存论旨，使质而不野，简而必诣”。他译经时采取灵活的方法，态度务实求真，僧肇在《注维摩诘经序》一文中描写他“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由此可见他在翻译时既要求“达”，又讲求“信”。慧观在

《法华宗要序》一文中，认为鸠摩罗什对《法华经》的处理是按照“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的做法去落实的。

鸠摩罗什主持翻译了大量的佛经，据说多达 400 卷，对当时佛学在我国的光大和佛教诸宗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翻译方法和理论可以说自成一派，最早提出了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对我国后来的翻译理论影响非常深远。不过，非常遗憾的是他的论述流传下来的极少。梁启超先生在对鸠摩罗什进行评论时这样说过：“‘天然语趣’四字，洵乃精评。自罗什诸经出，然后我国之翻译文学，完全成立。盖有外来‘语趣’输入，则文学内容为之扩大，而其素质乃起一大变化也……不特为我思想界辟一新天地，即文学界之影响亦至巨焉。”（《翻译文学与佛典》）

（三）玄奘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和“五不翻”

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大师辈出，在众多的大师中，玄奘是最了不起的一位，他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我国佛经三大翻译家。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西渡印度取经，前后历时 17 年，带回佛经 657 部，并于此后的 19 年间，主持译出佛经 75 部，共 1335 卷。此外，他还把《老子》、《大乘起信论》等译成梵文向印度介绍，是第一个把中国文化典籍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对宣传中国文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很多学者在研究玄奘时对他的这一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他的业绩将永远被全世界的人们铭记着”。（《伟大的翻译家玄奘》）除了惊人的翻译实践外，玄奘在翻译理论上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提出的翻译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张培基等《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 年）玄奘在翻译中已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巧，如词类转换，增益，省略，变更词序，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这些方法和技巧是前人想都没想到的，他与前人的最大不同是他不偏执，不会只盯着直译或者意译，而是根据需要灵活调整。梁启超曾这样评论说：“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翻译文学与佛典》）梁启超的评论可谓入木三分。

（四）马建忠的“善译”

马建忠在中国近代可以说是文化界的一代巨儒，他曾以《马氏文通》一书引起中国语文的巨大变革，除此之外，马建忠在翻译理论上也因他在理论上的独树一帜而名噪一时，他所写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就是一篇精彩的译论，为此，翻译界对他另眼相看，因为他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善译”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

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可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对于马建忠的理论，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他要求译者要有丰富的语言知识，必须清楚语言之间的异同；既要把握原文的内容，也要了解原文的风格，翻译时都要体现出来；译文与原文要对等，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够达到与读原文相同的感受。从马建忠的理论看，他所提出的“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可以说是“等值翻译”的最早雏形。我们的一些研究翻译理论的学者反复强调的费道罗夫的“等值翻译”论其实在我国早已存在。

（五）严复的“信、达、雅”

严复是中国近代人文思想方面的“一面旗帜”，因为他把西方思想、文化、制度不遗余力地介绍到当时的中国社会。康有为说他是“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与张之洞书》），蔡元培说他是“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几道为第一”（《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对于这样的评论，严复当之无愧。当然，严复除了是“西学东介第一人”外，他也是近代最杰出的翻译理论家，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天演论》1898）：“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尤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辩之者少，三也。”他认为，翻译应求其信和达，“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之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两者是统一的。“信、达”做到以后还要讲究语言文字的“雅”，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语），“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

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对我国 100 多年来的翻译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受到众多译者的推崇。然而，严复所处的时代是 100 多年前，提出这样的理论当属不易，因此也有它的局限性。对于“信、达”的原则，人们没有多大争议，而对“雅”的论述，却有很多的见解和说法，有人甚至说严复用一个“雅”字反而对“信”和“达”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六）鲁迅的“信、顺”观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除了在思想上“横眉冷对千夫指”，在翻译理论上也对翻译问题作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论述，

对当时翻译界影响很大。鲁迅先生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他明确提出的“直译”的观点。他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翻译原则，实际上是针对当时的胡译和乱译提出来的。其实，鲁迅先生极力主张“信”、“顺”兼顾：“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但是，我们不能认为鲁迅先生提出的“宁信而不顺”这一翻译原则与其他的翻译标准理论格格不入，他所提出的“直译”从本质上讲是要“正译”，强调的是要反对歪译、胡译和乱译。其实他对翻译有很深的见解，他在《小约翰》一书的《引言》中说的“务欲直译，文句也反而蹇涩”和在《艺术论》的《小序》中说的“仍若不能通贯，费时颇久，而仍只成一本诘屈枯涩的书”就能让我们体会到这一点。他在校改童话《小彼得》的译本时，认为“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三闲集·〈小彼得〉译本序》）由此可见，他主张直译，但并不赞成蹇涩和拘泥的译风。

（七）瞿秋白的“对等概念”

在 30 年代的文坛，瞿秋白是影响仅次于鲁迅的著名翻译理论家，他主张翻译“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文”，“翻译绝对不允许错误”，这多少有些偏激。其实，因为任何人在翻译时都不敢保证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正确”。但是，瞿秋白提出的一些论述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翻译要精确，就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翻译应当帮助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语言”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瞿秋白提出的正确的翻译标准是：“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转引自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实质上这就是“动态对等”的早期雏形，比尤金·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论要早 60 多年。

（八）茅盾的“再现意境”

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为我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他除了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外，还翻译并发表了外国文学译作 240 篇，给我国译坛留下一份宝贵遗产，因此，他既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除此之外茅盾在翻译理论上也非常有独创性。早在 1921 年，他就拿绘画与翻译相比，提出了翻译中的“神韵”一说，傅雷的翻译观可以说是从茅盾那里得到启示的。在茅盾的译论中，他创造性地指出：“再现意境是文学翻译的最高任务，让译语读者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美的享受。对于一般翻译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至少应该是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但对于文学翻译，仅仅这样要求还是很不够的。文学作品是用语言创造的艺术，我们要求于文学作品的，不简单是事物的概念和情节的记

述，而是在这以外，更具有能够吸引读者的艺术意境，即通过艺术的形象，使读者对书中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强烈的感情。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这样的翻译过程，是把翻译者和原作者合而为一，好像原作者用另一国文字写自己的作品。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发挥工作上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好像一个演员必须以自己的生活和艺术修养来创造剧中人物形象，而创造出来的人物，又必须完全符合于剧本作家的原来的意图一样。”（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1954年8月）

（九）傅雷的“神似”论

傅雷因其译作《巴尔扎克选集》而在中国当代翻译界享有很高的盛誉，同样，他的翻译理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独树一帜。许渊冲先生把傅雷的翻译观总结为四点（《出版广角》1996年第6期），即：①“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②“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以上两点见《高老头》重译本序）③“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无论如何要叫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文”；④“只要有人能胜过我，就表示中国还有人，不至于‘廖化当先锋’，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以上见罗新璋的《翻译论集》）

在傅雷的译论中，有许多精辟的话是对译者在如何加强自身的学识修养、译者的人生经验以及学识修身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意义等方面提出来的。以下这几段话就能反映出他对这些方面的精辟的看法：

“由于我热爱文艺，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作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就觉得不能容忍，所以态度不知不觉地变得特别郑重……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琢磨出来。”（《翻译经验点滴》，1957年5月）

“事先熟读原著，不厌其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翻译。平日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旧小说不可不多读，充实词汇，熟悉吾国固有句法及行文习惯。……总之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的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的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给罗新璋的信》，1963年1月）

“文学的对象既然以人为主，人生经验不丰富，就不能充分体会一部作品

的妙处。而人情世故是没有具体知识可学的。所以我们除了专业修养、广泛涉猎以外，还得训练我们的观察、感受、想像的能力；平时要深入生活，了解人，关心人，关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趋的（地）跟在伟大的作家后面，把他们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因为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家一般的刻苦顽强。”（《翻译经验点滴》，1957年5月）

（十）钱锺书的“化境”说

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涵盖古今、广征博引、通而化之，是中国当代不可多得的大学问家，他对于翻译理论也有独特的见解，最著名的是他的“化境”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锺书，《七缀集·林纾的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钱锺书的“化境”，为我们指出了翻译的最高理想。任何一个译者，都应该追求这个理想。当然，作为翻译标准或原则，这个要求是太高了。钱锺书自己也说“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然而，倘若把这个“化境”比作一座高山的顶峰，我们努力去攀登，即使攀登不到，来到半山，也有一番景色。

（十一）许渊冲的“译经”

在把中国古典诗词译成外文方面许渊冲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人，他为我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许渊冲丰富的翻译实践使得他在翻译理论上有精辟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诗词翻译的“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②文学翻译的“三似新论”（形似、意似、神似）；③诗词翻译的“三化”论（等化、浅化、深化）；④诗词翻译的“三之”论（适之、好之、乐之）；⑤直译和意译新论；⑥文化竞赛论；⑦发挥汉语优势论；⑧诗词翻译以创补失论；⑨诗词翻译的创新论；⑩文学翻译理论的艺术论。此外，他还总结了《译诗八论》（译者一也，依也，异也，易也，意也，艺也，益也，怡也）。（参见《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他的“三之”论的具体内容确实有其独特的一面：“那与其争论傅译与新译哪种更近原文风格，不如直接问哪种译文更能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所谓‘知之’，就是知原文说了‘什么’；所谓‘好之’，就是喜欢译文这个‘说法’；所谓‘乐之’，就是读来感到乐趣。自然，要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首先要译者自己‘知之、好之、乐之’，能否引起读者共鸣，那就要

实践来检验了。”再看他的《译经》：“译可译，非常译；忘其形，得其意。得意，理解之始；忘形，表达之母。故应得意，以求其同；故可忘形，以存其异。两者同出，异名同谓：得意忘形，求同存异，翻译之门。”更是精彩。（《出版广角》，1996年6期）

许渊冲先生把他的译论总结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他曾这样解释道：

“总结一下，我从鲁迅提出的‘三美’论中选了一个‘美’字，从钱锺书提出的‘化境’说中选了一个‘化’字，从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中选了一个‘之’字，加上朱光潜的‘艺术’二字，把文学翻译总结为‘美化之艺术’五个字。这就是说‘三美’（意美、音美、形美）是本体论，‘三化’（等化、浅化、深化）是方法论，‘三之’（知之、好之、乐之）是目的论，‘艺术’是认识论……

“此外，我又从郭沫若提出的创作论中选了一个‘创’字，从傅雷提出的神似说中选了一个‘似’字，从我提出的发挥优势论中选了一个‘优’字，再加上我提的‘竞赛’二字，又把文学翻译总结为‘创优似竞赛’五个字。这就是说，创造美是文学翻译的本体论，发挥优势是方法论，神似是目的论，竞赛是认识论。‘创优似竞赛’和‘美化之艺术’并不矛盾，因为本体论是创造‘三美’，方法论的‘三化’都要发挥译语优势，目的论的‘神似’才能使人知之、好之、乐之，认识论的‘竞赛’也是一种艺术，这样总结前人的经验，再联系自己的实践，我就把中国学派译论概括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译学要敢为天下先》，《中国翻译》，1999年第2期）

许钧先生曾这样总结许渊冲先生的翻译实践和理论：“所翻译的文学作品被收入外国的文学经典丛书，你是国内第一人，为中国文化登上世界文坛宝座开辟了道路，可以说是本世纪中国译界最有成就的翻译家之一。关于翻译实践，拿钱锺书先生的话说：‘足下译著兼诗词两体制、英法两语种，如十八般武艺之有双枪将，左右开弓手矣！’关于翻译理论，你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了系统的翻译学说，在国内译界引起强烈反响，在国外也有影响。”（《翻译：“美化之艺术”——新旧世纪交谈录》，《译林》，1998年第3期）

（十二）刘重德的“信、达、切”

刘重德先生提出“信、达、切”新三字原则，这种提法很有意思，虽然看上去与严复“信、达、雅”有些相似，但却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这一提法可以回避长期以来对“雅”的争论：信——信于内容；达——达如其分；切——切合风格。刘先生对于他的新三字原则是这样阐述的：“我之所以不采用严复所讲的‘雅’字，而改用‘切’字，是因为‘雅’即所谓的‘尔雅’或